

斯诺文集

大河彼岸

又名：今日的红色中国

新 华 出 版 社

大河彼岸

又名：今天的红色中国

埃德加·斯诺 著

新民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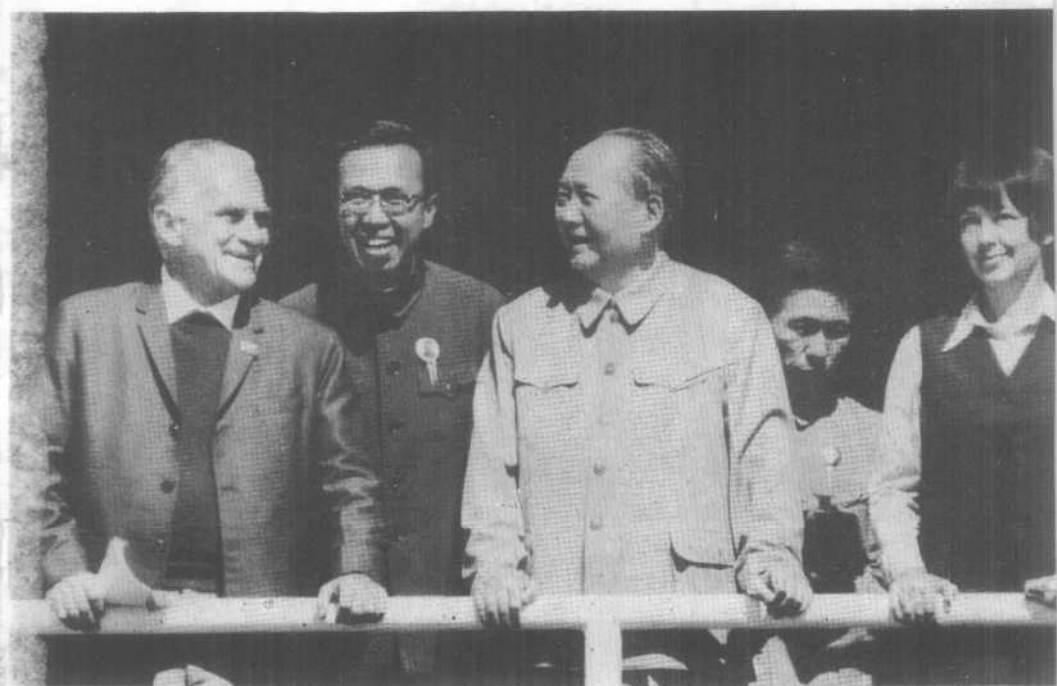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插页8页 15.5印张 359,000字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28,700册

统一书号：10203·137 定价：2.00元

法律正义竟以河为界。多么可笑！……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可笑呢：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

——巴斯卡尔



国庆二十一周年时，毛泽东同志和斯诺
及其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1970年）



毛泽东同志会见斯诺，中为马海德。（1960年）



毛泽东和
刘少奇同志会
见斯诺。



周恩来同志和斯诺在北京怀柔水库。（1960年）

毛泽东同志为斯诺在《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上签名留念。右一为马海德，右二为路易·艾黎。（1960年）



斯诺夫妇在延安
参观毛泽东同志住
过的窑洞。



斯诺（右）和溥仪在北京。（1960年）



出版前言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一生写了大量著作，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报道，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他写的几部关于中国的名著，曾被连续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有力地促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了解，使中国人民为争取进步的斗争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斯诺的记者生涯，是和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斯诺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通过目睹中国的内忧外患，他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同情，增强了正义感。一九三六年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历时四个多月。他深入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访问了红军指挥员和战士，访问了解放区的群众。这些访问加深了他对中国革命斗争的了解，使他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后，斯诺深情脉脉地写到：“在许多书页里，我仅仅把那些英勇的男女们告诉我的记录下来。同这些英勇的男女们生活在一起，并督

DKS 9/55
时间他们等同起来，这是我的殊荣。”“现在他们每天正在用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写着许多别的书，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原来在这些老资格‘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未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哩！”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迫害进步人士，斯诺在美国处境十分困难，后来移居瑞士。然而他拿着美国护照，得不到访华的签证，他和中国的关系被人为地割断十余年。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他才以美国作家的身份取得签证，访问新中国。此后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〇年又两度来访。每次访问，他都搜集了大量材料，通过报道，生动地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讴歌人民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斯诺是中国人民诚挚的朋友，数十年如一日，为促进中美两国伟大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对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麦卡锡主义对他全家的迫害，国际上对新中国的歪曲和诬蔑，都没有损害他对中国人民的情谊，没有使他丧失对中美人民终将冲破重重障碍，开拓友好合作道路的信心。新中国是斯诺心爱的话题。他为读者著书，给青年讲课，对公众演说，给朋友写信，同客人说话，都离不开中国。在临终时，他用尽了生命的最后力量所讲的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中国人民沉痛悼念斯诺的逝世，毛泽东主席在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指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这位诚挚的朋友，为了表彰新闻战线上这位出色的战士，我们决定出版《斯诺文集》。这套文集先出四卷，主要搜集了斯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一九五八年首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斯诺记者生涯的自述。书名取意于庄子的话：“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他的一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结婚以前的游历记者的生活；在北京定居后对中国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对中国、印度、苏联等地的访问情况。这本书穿插了一些回忆和思考，尤其详细记述了他同宋庆龄、甘地和罗斯福等人的交往。文笔精练，引人入胜。书中谈到，他已赢得了“报道一贯准确的名声”，甘地曾对他面誉道：“我们尊重你的诚实态度。”

第二卷《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九三七年十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这是访问陕北苏区后震动世界的名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英雄的革命业绩。这本书问世后，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五次，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国内外许多青年读后，走上革命的道路，誓作旧世界的叛逆者。当年国统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翻译出版时，为便于躲避反动派的检查，取名为《西行漫记》，如今我们重新出版时，恢复正名《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同志曾经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

第三卷《为亚洲而战》(《The buttle for asia》)，一九四一

年由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描述了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热情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反共反人民的丑态，并以中日战争为背景，论述了国际之间的关系。斯诺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充满信心。他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书的后半部介绍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的缘起和发展，然后是长篇报道作者在一九三九年重访解放区的见闻，重申了民主、自由的中国必胜的信心。此外，在本卷中我们还选了斯诺有关评蒋介石《中国的命运》和有关中国抗战前景的若干篇文章。

第四卷《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一九六二年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书前引用了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尔的话：“法律正义竟以河为界，多么可笑！……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可笑呢：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这里“河”只是人为国界的代名词。斯诺引用这段话，是为了讽刺美国对华敌视的政策，主张撤掉中美人民之间的人为障碍，说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向美国人民介绍“河的彼岸”的真实情况。在书中，斯诺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新中国。他记录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描述了与他们重叙旧谊的欢快。毛主席对斯诺说：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这期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书末一章命题《前面的长征》，正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的前途所寄予的深情厚望。

在这四卷之后，我们还将继续编辑出版斯诺的散文特写集和其他著述。

斯诺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记者，他的作品文字优美，论理

透彻，引人入胜，堪称世界报告文学巨著。作为记者，他采访深入，作风严谨，高瞻远瞩，具有锐敏的洞察力。他在中国的采访活动，描摹出一幅幅时代的巨大画面，发出动人的异彩。他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史料丰富，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典的百科全书”。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诺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记者，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史学家。

《斯诺文集》除了《红星照耀中国》曾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过外，均为首次在我国公开发行。出版这套文集不仅对新闻文化界是需要的，而且对全国人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斯诺在中国的老朋友，这些书是极好的纪念品。重温斯诺在中国的经历，使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更加奋发前进。

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来说，从斯诺身上可以学习那朴实无华，诚挚勤奋、信任人民、前进不息的品德。他笔下对旧中国和新中国的朴素而生动的描绘，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几十年取得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光明前景，鼓舞我们为四个现代化的壮丽事业作出踏实的和坚韧的努力。

对于新闻文化界的同人来说，斯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财富，而且他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问题的态度，及其为了探索真理，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为了更好地研究斯诺，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除删去了个别章节，和对某些明显的史实错误及人名、地名和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作了改正外，基本上保持了原作的风格和内容。我们相信，广

大读者是会用分析的态度和历史的的眼光来阅读这部文集的。

在出版本书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对此我们谨致衷心的感谢。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五月

序 言

《方生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一书是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作盲目的冒险性探索的传记(不单止我个人的),书中详尽地记述了我个人的经历,足够满足有理智的读者的好奇心——考虑到本书所涉及题目,你更有理由感到惊奇。它旁及了当我二十二岁时到达中国的其他情况,当时我开始了在麦考密克上校开办的《芝加哥论坛报》中当国外记者的生涯。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中国可以说是知名人士,因为我是第一个冲破“国共内战”的屏障而获得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国红军领袖会面与拍照的外国人。那是二十五年前(即一九三六年)的事了。其后一年,为了组织起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和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提出了停火协定。当时我是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的特派记者。我的报道还先后刊登在《生活》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上,后来我还当上了《星期六晚邮报》的国外记者,然后又当了多年的助理编辑。

毛泽东亲自向我讲述了他本人的事迹,并且向我叙述了到

那时为止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这些情况都已记叙于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拙著《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中。此书英文版尚未发行时，中译本已经面世，并且首次向中国人民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消息。当年的年轻读者今天重逢时，很多已是中国第二级或第三级的领导人。

以上种种历史背景使我在一九六〇年再访中国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北京与华盛顿双方仍存在着敌对的状态。到过红色中国的西方人中，极少数是革命前曾在中国居住过。我相信在战前驻中国的美国记者群中，我是第一个有机会重访中国的。

综观上文所述，有些人可能会臆测我到中国的签证是很容易取得的；但恰恰相反，我的申请表被耽搁了几年才批准下来——并且是一直搞到政府的最高层才被批准的。原因是：十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都是基于一个无视现实的妄自忖测上——即北京政权不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而是莫斯科的一个言听计从的傀儡。但在北京政府成立十二年后，世人已清楚看到这种言论的错误。其后，人民共和国曾多次提出了重开交通的建议，但都被美国国务院所拒绝。我重访中国的申请被艾森豪威尔集团拼命阻挠。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已出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除了未强迫我非法进入中国之外。

国务院还发出过几次官方消息，使人认为对于美国人之所以不能到中国去，北京政权应负全责。事实却不是如此简单。虽然，中国方面现在采取的立场是：由于美国政府没有诚意谈判结束美国对台湾的武装防卫，双方互派记者是无用的。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中国政府曾经为许多美国人签署了入境证，其中

包括记者和作家。而真正使美国人不能到中国去的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因为他当时禁止一切美国人到中国访问。他威胁地宣称：任何违反上述禁令的人，将会失去他们的护照和可能被罚款或监禁；对于一些反对他的“不准出版有关中国书籍禁令”的有影响力的出版家，他又抛出了什么总统特权等法令。于是多年以来，这位国务卿使整个美国完全脱离了有关中国革命伟大事业的直接消息。

直到一九五七年，杜勒斯先生最后炮制了他自己认为有资格派代表到中国去的新闻单位的名单——如果他们得到北京签证的话。北京方面宣称：除非美国方面同意接纳数目相同的中国记者到美国去，否则中国不能接纳他的所谓“合格”记者。杜勒斯先生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说什么美国移民法禁止签署给共产党人的入境证。但这个借口是骗不到人的，因为苏联及其他共产国家的记者都已破例地获得了签证，这完全是有例可援的。然而，这个问题就如此的搁置下来，直到杜勒斯先生的逝世。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继续为以游客身份到中国去的美国人签发证件，但美国政府仍然不准美国人到中国去。在艾森豪威尔当权期间，很多著名的美国人，如埃莉诺·罗斯福和艾夫里尔·哈里曼都获得中国方面的签证，但是都被国务院以违犯国法的警告而致告吹。

一九五八年，经过了三年毫无成果的努力之后，北京政府放弃了和美国修好的愿望。这种转变的原因将于下面详述，但简而言之，即周恩来后来以最坚决的语气告诉我，他的政府认为在美国政府同意在处理两国争端的问题上双方不采用武力，